

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

● 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方行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

●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方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方行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5004-5806-1

I. 中… II. 方… III. 经济史—中国—文集
IV. 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640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郑以京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54.75 插 页 2
字 数 1010 千字
定 价 86.00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专家专题文集。各篇文章的作者都是该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全书共收论文53篇，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主，兼及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比较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最深层次的最新进展。



吴承明先生近照

编委会名单

主编 方 行

编委会 方 行 刘福寿 吴太昌 陈其广
刘兰兮 王玉茹 詹小洪 吴伯均
张 耕 徐建青 魏明孔

序

今年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和九十华诞。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祝贺他健康长寿，纪念他老当益壮的敬业精神和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一

吴承明先生 1917 年生于河北滦县。幼年曾接受私塾的传统教育。1934 年入学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日寇侵华凶焰日炽，先生奋起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等组织，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以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参与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秋被迫离校，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平津学生和医务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翌年服务团解散，即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1940 年毕业后，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并任《新蜀报》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职务。

1943 年冬，吴承明先生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以优异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贝塔·西格马·伽马”荣誉学会会员。1946 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S. S. Kuznets) 受聘任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吴承明先生作为他的助手回国，到该会经济研究处任专门委员。1947 年初，改任上海中央信托局襄理，并兼任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央外资企业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职。1958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至今。并曾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特邀顾问等职。又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讲学。2006 年 8 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忠诚的爱国热忱，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知识素养，为他的学术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吴承明先生学贯中西、融通今古。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密切结合的典范。

他精通计量经济学，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从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产值、市场商品量等估计的专题论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了比较全面的评量，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开始了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这是他一生中费时最长、用功最勤的学术课题，寝馈于中者凡三十余年。他从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着手，组织人员对重要工商行业和企业进行调查，收集资料。积十年之功，收集整理资料达数千万字，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八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于 1992 年完成。许涤新先生不幸于 1988 年逝世，因之该书从规划设计、重点章节撰写到修改定稿，均由先生主持。该书的特点是分析不同时期外国资本、官营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消长、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水平，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崎岖道路。这部著作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多次获得国内重要学术奖项，英国并有其第一卷译本问世。

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深厚功底，深知市场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中的重要作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市场问题的研究。在规范研究方面，他从交换和市场史的研究中，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提出交换先于变革自然的“生产”，并经历了劳动交换、商品交换、智能交换等五种形式。他从构建交换与经济发展模式中，更提出了交换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导数的论点。在实证研究方面，他运用大量史料和计量方法，从商路、市镇和商品运销等方面，研究了明代国内市场、清代国内市场和近代商品流通的宏观模式。20 世纪末，又进而将市场研究提升到从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的变化入手，以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的影响。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肇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论点。他又以

经济为主，以社会和思想为参照，从物质层次进而到制度层次乃至思想层次，论述了 16—17 世纪中出现的现代化因素。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使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别开生面。

三

从 20 世纪末起，吴老又致力于经济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以求索学术思想的升华。

他坚持发展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有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的的趋势是进步的，是向前发展的。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所撰写很长篇幅的词条《中国经济史》，是对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所做的系统总结，也是他这种历史观的反映。他提出中国的封建主义，由于吸收和容纳了异质的商品经济，并将它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能动因素，在 16 世纪以后就发展为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

他认为任何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经济，即一代有一代的经济，提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者地区。他反对用理论模型推演历史。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应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不能用公式“伪装精确的知识”（F. A. 哈耶克），“用时间变量来代替思考”（R. M. 索洛）。经济史研究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宜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填充历史。历史认识又具有相对性。他认为，历史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但已认识清楚的事情，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时代思潮的进步，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再认识。历史学就是无休止的再认识。

他认为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层面因素互动的结果。他把经济史学定义为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不仅是考察物质发展的量，还要考察制度改革的质，两者具体化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中国，在这种考察中要特别注意国家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而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深层次上都要受意识形态，在中国即儒家思想的制衡。他认为，两千年，特别是宋代以后，儒家思想是有变化的；其制衡作用，长期以来主要是积极的，18 世纪以后，消极一面为多。

针对西方“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现代”对立的理论，他

提出事物内部都具有能动因素，甚至对立物之间也具有互补功能的论点。他通过对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实证考察，指出传统农业不仅可以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并且还可以提供剩余。充分利用手工业和传统的手工业与农民经济相结合的功效，有可能走出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

他重视实证主义，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史不可须臾背离的基本方法。中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历史传统，西方也重视实证，即使是一部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也首先要求检验资料和数据的正确性。历史应当有价值评判。实证主义不作价值评判是其局限。不过经济史的价值评判颇难，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量，即采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则应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件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代乃至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

他主张“史无定法”，应当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种学派的方法，均可采用。他强调指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是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选用理论应当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这是他方法论的基本点。

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他近年出版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和《吴承明集》等文集之中。目前，吴老以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正在撰写一本《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的著作，可望于近期问世。老树繁花，令人仰慕。

四

吴老为人，宽厚平和，谦虚豁达。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孜孜以读书治学为务。虽届耋耄之年，但他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勤奋精神，毫不懈怠。吴老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后进请益，谆谆善诱，百问不烦，必至释疑解惑而后已。吴老之风，可改古人诗句为其写照：“鸳鸯绣取从君看，更（原文为“不”）把金针度予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桃李芬芳，大都乘风扬帆于学海，成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力量。

本文集收集论文53篇，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主，兼及历史、社会、文

化等方面的内容。文章殆属新知灼见，富于创新精神，略见中国经济史暨有关学科研究的时代面貌。文章作者均吴老的同学、友好和门人，慨允惠赐宏文，谨此忠诚感谢。我等知识有限，难免疏失，乞予指正。本文集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 | |
|-------------------------------------|--------------|
| 序 | (1) |
| “传统”“现代”的话语对立与理论预设 | 陈庆德 (1) |
|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方法 | |
| ——以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为例 | 赵凌云 屈永华 (36) |
| 新世纪经济史学：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 | 陈争平 (44) |
|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 | |
| ——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 李根蟠 (55) |
|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关系探析 | 董志凯 (71) |
| 农业经济发展研究中的若干方法问题探讨 | 陈其广 (85) |
|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 吴太昌 (109) |
| 从官营工商业到国有企业改革 | |
| ——中国国家资本演变的历史分析 | 武 力 (118) |
| 中国最早的纸币 | |
| ——交子 | 孙 健 (137) |
| 关于中国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若干思考 | 林 刚 (144) |
| 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增长 | 吴柏均 (155) |
|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 |
| ——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 叶 坦 (175) |
| 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 | 史建云 (201) |
| 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 探讨 | 郑学檬 (214) |
| 唐代对外政策的两重性：对内封闭对外开放 | 魏明孔 (226) |
|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棉布探源 | 苏金花 (237) |
| 宋朝“寄籴”考论 | 李 晓 (244) |

| | | |
|------------------------------------|------|-------|
| 宋元江浙诸郡稻米单产试探 | 周生春 | (263) |
| “小生产”、“大流通” | | |
| ——再论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 | 张忠民 | (278) |
| 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看技术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 | |
| 李约瑟之谜再探 | 赵津云妍 | (295) |
| 三农与市场 | | |
| ——以明清经济发展为例 | 江太新 | (311) |
| 郑和之后：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海洋贸易与制度选择 | 龙登高 | (328) |
| 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 史志宏 | (338) |
| 明清时代皖南佃仆奴仆辨 | | |
| ——为祝贺吴承明先生九十寿辰而作 | 魏金玉 | (363) |
| 清代小农家庭规模的考察 | 郭松义 | (374) |
| 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 | | |
| 移民与清代四川城镇经济 | 陈家泽 | (401) |
| 十九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 | 李伯重 | (434) |
| 清代河南的四大商镇 | 许檀 | (460) |
| 徽商的历史性贡献 | 叶显恩 | (477) |
| 清代泉州黄氏郊商的乡绅关系 | 陈支平 | (483) |
| 关于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 | |
| 近代农民负担与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 | 郑起东 | (507) |
| 政治与经济之间：张、李之争与汉阳铁厂之厂址决策 | 袁为鹏 | (524) |
| 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与我国近代钢铁市场 (1908—1927) | 代鲁 | (539) |
| 对华国际银团的演变 | 宓汝成 | (566) |
| 战时日本对中国内地及台湾的矿业经营模式 | | |
| (1937—1945) | 陈慈玉 | (584) |
|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 | 朱荫贵 | (604) |
| 中国近代民营企业集团研究（节选） | 张耕 | (622) |
| 厦门市15种重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的编制 (1929—1935) | 刘兰兮 | (656) |

| | |
|--|---------------|
| 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 | |
| ——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中心 | 虞和平 (662) |
| “一五”时期的投资、市场与制度变革 | 徐建青 (682) |
| 从美国的筑路运动看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现状和发展 | 王玉茹 (699) |
| 《全宋诗》证误举例 | 方 健 (709) |
| 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 | |
| ——《姑苏繁华图》 | 范金民 (730) |
| 清代县政管理的百科全书 | |
| ——评黄六鸿《福惠全书》及其为官之道 | 刘秀生 (762) |
| 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 | 梁其姿 (770) |
| 美国五次并购浪潮的回顾 | 朱宝宪 吴 洪 (787) |
|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状况分析 | 詹小洪 (812) |
| The Managerial aspects of Chinese trading junk from the Song through the Qing | 斯波义信 (820) |
|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ies” | 岸本美绪 (831) |
| 高山仰止 | 赵德馨 (856) |
| 珍贵的一课 | 刘福寿 (861) |

“传统”“现代”的话语对立与理论预设

当人类学为了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置身于不断增强的全球相互依赖性中并更多地扩展到，现实实践领域中时，也就缠绕在了“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中。然而，对理论预设的否认，使其常常以固化的方式来对待该问题。这一问题甚至超越了人类学领域，而在当今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具有普遍性。

传统的实质内容

传统显然是一种社会现象。每天每日，我们都在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传统的影响下做着成百件的事情，却经常恰恰认识不到我们正面对一种传统。

传统实际上是由以往社会验证了的人们适应行为的合理性。每个合理的活动都预设了某种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以一种可预言的或部分可预言的方式作出反应。传统便是把相当程度的秩序和可预言性带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确立起大量赖以自我调整的规则。如果你不知道世界会对你的活动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世界上合乎理性地活动。

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分类，传统具有重叠的三种功能：1. 使各个真实的或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或象征化；2. 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利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3. 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这些功能隐含于或来源于对一个共同体和/或那些代表、表现或象征这一共同体的制度的认同感。^① 这便把地方性、特殊性或相对性赋予传统。这些重要特征使“传统”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使它不可能轻易地移植。而如果有人试图在缺乏这种传统的地方让它扎下根来，那他也会遇上一场真正的斗争。社会生活之所以需要传统，就在于它把这

^① 参见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12 页。

些规则作为传统而延续，而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是否合理、必要、有益、美好或合乎心愿等等，这些规则的存在本身或许比它们的具体优劣更为重要。

传统蕴含着人们对一致性的追求；以“仿效”的隐喻蕴含着人类发展的连续性，从而提供了人们抵御堕落的那一背景和目的的确定性。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已经确立的权利。基于这些事实基础，霍布斯鲍姆曾指出：“‘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因此，传统无非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① 传统的各种功能的核心指向，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生活转型过程的连续性。

理解了理论预设的总体性。甚至可以说，知识就是传统。在此基点上，传统的含义就不止于束缚，波普尔就说过：“所谓自由实际上只是从一种传统转变到另一种传统。”^② 我们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一个人如果抹掉传统的话，那他必定连带地也把他自己所有的观念和他关于未来的蓝图一起清除掉。

传统并非固化的，今天存在的一切就是明天的传统。莫里斯·哈布瓦赫以福音书所再现的由一个群体共同持有的一种或一批记忆的变化表明：

任何见证都会对目击者提出似乎矛盾的要求：目击者在事件发生时要离开群体去观察事实，而当他去描述这些事实时，又要重新回到群体里面。也就是说，前前后后（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他必须首先摆脱他作为共同体一员的身份，然后又要重新确定他的这个身份。^③

这样，“人们为了证实自己的感知，需要从近处观察一个客体，而为了保存集体记忆，他们又需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这个群体距离这些事件越是遥远，也就越有可能会对它所保存的意象进行润色粉饰，加以重

^①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第2—3页。

^② [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③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塑和完善”^①。因此，“一代复一代，记忆并没有更加准确，而是恰恰相反”^②。这便赋予集体记忆双重性质：

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③

正是以这种方式，“古老群体的传统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记忆的天然支撑物”，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新的共同体“消化吸收了古老群体的传统，使之融入自己的记忆之流中，并使它们摆脱了已经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的过去……同时，通过改变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改写了这些传统”。“通过不同寻常的对应、通过出乎人们意料的对立，以及通过合并，更新了这些传统。”^④当今天不少的人类学者迷醉于对所谓原始的、与世隔绝的“传统”的寻求与描述时，却没有明白，这些“传统”实际上都是已在全球化体系中发生了变化的文化存在，或许可以说是“新传统”。霍布斯鲍姆认为：

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⑤

这样看来，“保护传统”的说法和某些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从来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种活的过去，而是必须成为‘被发明的传统’。另一方面，真正传统的力量和适应性并不因为‘传统的发明’而变得迷惑不清。在旧方式依旧起作用的地方，传统既不需要被恢复，也不需要被发明”^⑥。

“一个传统要想延续下去，就离不开后代有意识的占有。”^⑦在传统凭借记忆而展现的过程中，记忆成为了传统的载体。正如哈布瓦赫所言，记忆在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每一个记忆的发生，都需要得到被时空

^①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323页。

^② 同上书，第33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73—374页。

^⑤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第1页。

^⑥ 同上书，第10页。

^⑦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